

在文学馆听讲座

ZAI WEN XUE GUAN TING JIANG ZUO

历史的圈套

舒乙 傅光明 / 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录系列丛书2001/2002年度 第一辑·总第四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文学馆听讲座

舒乙
傅光明
主编

第一辑 历史的圈套

第二辑 生命的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文学馆听讲座·历史的圈套/舒乙,傅光明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8
(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录系列丛书 2001/2002 年第 1 辑)
ISBN 7-5004-3480-4

I. 在… II. ①舒… ②傅… III. 文学-讲座
IV.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747 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博尔
版式设计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仰山印刷厂	装 订 精美华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46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名家演讲 荡气回肠

陈漱渝

新时期以来关于鲁迅的若干次论争

傅光明

历史·圈套·真实的神迹——老舍之死

附录：

纪念老舍先生逝世35周年——《太平湖
的记札》出版座谈会

田本相

曹患的苦闷

徐城北

城楼·城门·城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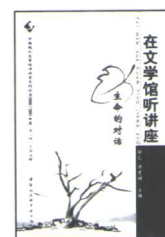
刘震云

从《一地鸡毛》到《一腔废话》

周汝昌

《红楼梦》人物的内心世界

5/8/06



总策划：博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 新时期以来关于鲁迅的若干次论争 陈漱渝(1)
- 历史·圈套·真实的神迹
- 老舍之死 傅光明(44)
- 纪念老舍先生逝世 35 周年
- 《太平湖的记忆》出版座谈会 (99)
- 附录一 贾凯林致郑实、傅光明信 (171)
- 附录二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丁 东(175)
- 附录三 挖掘记忆 李 辉(178)
- 附录四 对历史的激情与沉思 郭小聪(181)
- 附录五 嶙峋的往事与记忆 王得后(185)
- 曹禺的苦闷 田本相(188)
- 城楼·城门·城文化 徐城北(228)
- 从《一地鸡毛》到《一腔废话》
- 谈我的小说创作 刘震云(264)
- 《红楼梦》人物的内心世界 周汝昌(295)

新时期以来关于鲁迅的 若干次论争

陈漱渝*

2001年8月5日

傅光明:今天是新一轮中国现代文学馆星期日义务演讲的第一讲,第一讲我们就特意安排了讲鲁迅。毛主席对鲁迅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学的主将,他不光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今年是鲁迅先生120周年诞辰,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馆特意请来了鲁迅博物馆的副馆长,鲁迅研究专家,著名学者陈漱渝先生,为我们演讲“新时期以来关于鲁迅的若干次论争”,我想朋友们可能有的不是很了解,我对若干次的论争有的也不是十分清楚。新时期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在大学读书的大学生,历次关于鲁迅的论争,怎么样论争,论争的内容如何,焦点如何,最后又有一种怎么样的评估或者结论性的东西,都无从了解。我想这个题目会带给我们大家许多新鲜的东西,我们对关于鲁迅的若干次论争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一份判断。接下来我们欢迎陈漱渝先生为我们演讲。

主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感谢大家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来听我的肤浅之论。去

* 作家,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

年我曾经到现代文学馆来作过一次讲演,题目呢叫做《人之子鲁迅》,主要是介绍鲁迅的人学思想。这次换一个题目,叫做《挑战经典》也可说是《挑战鲁迅》,副标题是“新时期围绕鲁迅的若干次论争”,主要介绍从1976年到目前这25年来围绕鲁迅展开的一些论争。这些论争有的并不局限于鲁迅研究界内部。有一些论争虽然学理性比较差,但是社会影响比较大,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是新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所以系统梳理一下也许并不是没有必要。

我下边所做的介绍虽然力求客观,但总不会没有自己的倾向性。鲁迅讲过,人世间不会有那么一道矮墙,让你骑在上边,两脚着地,左右稳妥,毫无倾向性。拿人来说,有胖的,瘦的。有的说我不胖不瘦。不胖不瘦的也是或者倾向于胖,或者倾向于瘦,所以不会说一点倾向性没有。所以我只是作为一家之言来发表意见,作为当前众声喧哗当中的一种声音来供大家参考。我是第一次讲这个题目,肯定会有些生疏和把握不准的地方,请大家能够谅解。另外,我看今天听众,年龄的文化层次参差不齐,所以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听众可能觉得我讲得肤浅,啰嗦,而另一些业余文学爱好者,可能觉得内容有点陌生,这也是要大家谅解的。

那么什么叫挑战经典呢?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心目当中,鲁迅作品的经典地位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有的学者就很宽心地讲:鲁迅的作品已经进入了经典,不需要任何人来保卫。什么叫文学经典呢?文学经典应是历代作家作品中长存读者记忆当中的那一部分,或者说经典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它垂范于后世,但是为数有限。它并非流行,它不是流行歌曲、流行音乐,但是它却比流行更为久远。每次我们重新阅读都有一种历久弥新的感觉。判断经典学术价值的是批评家,决定经典流传价值的是读者群。在经典和读者之间也经常进行着一种互动。

毫无疑问,经典的构成总是有其相对稳定性的因素,不是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我们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能够成为经典,

总是有它固有的客观标准,比如说它的内容总应该是真善美而不应是假恶丑,它在形式上总是具有一种不可重复性,而不是单纯模仿工作。还有作家在作品当中体现的思想穿透力。郁达夫评论说,当别人观察了事物现象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本质,人们刚看到眼前的时候鲁迅已经回顾了历史和展望了未来,所以他的思想是具有穿透力的。此外,经典作品还会对历史的进程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一种推动作用。一般来讲总是具有这样一些综合的因素,它才可能称之为文学的经典。

但是经典又是流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长期被人视为经典的作品也会受到质疑和重新审视。比如说我们过去读鲁迅的作品,往往推崇他后期的杂文而忽视他前期的文言论文,后期杂文当中往往牵涉到几个名篇,像1937年毛主席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讲到鲁迅的政治远见,举了一篇为例,叫做《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毛主席讲鲁迅预见到中国的托洛斯基派会堕落成为汉奸,拿日本人的津贴。现在看来,《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能不能称之为经典呢?这恐怕不行。因为托派是党内的一个反对派,在抗日问题上它和党是一致的,像给鲁迅写信的那个托洛斯基派分子陈其昌化名陈仲山,他本人就是抗日战争期间慷慨捐躯的,是个抗日烈士。他怎么拿日本人的津贴呢?

反过来倒是我们忽视一些的文言论文,我们发现里面还有那么珍贵的思想,像鲁迅在《科学史教篇》里边讲到“致人性于全”。文化活动的宗旨要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所以打倒“四人帮”以后周扬复出,重读鲁迅的文言论文觉得真是不得了,跟马克思主义观点是达到了一致,而当时鲁迅才27岁呀。所以长期认为具有历史唯心观的这些作品,现在我们重读觉得非常了不起,有些过去流行的篇目现在重读觉得它显示出了比较严重的历史局限性。所以即使被人视为经典的作品也会受到质疑、挑战和重新审视。在这样一种再选择的过程当中,伪经典就会被淘汰出

局,而真正的经典却经过了冲击和磨砺,放射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

无论古今中外,经典作品都会面临诸多的挑战。新时期以来,围绕鲁迅的问题展开过多次的论争,时间跨度是25年,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也就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今天。在这25年当中,我们又习惯于把开始确立市场经济模式的1992年作为后新时期的开始。在这四分之一世纪当中,鲁迅研究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和变化的条件下,在中外文化和文学思潮空前冲撞交汇的形势之下进行的。

作为对鲁迅研究发生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首先应该提及的就是发生于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场大讨论。我可以比较放肆地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深奥的哲理,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我不是政治理论家,我是学文学的。比如30年代,周扬在跟“第三种人”论争的过程当中,他就讲过,实践才是真理的决定标准。再往前推,五四时期胡适也讲过类似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1978年的这一场大讨论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它特定的政治针对性,所以就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

讨论发生在什么时期呢?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历史拨乱反正的这么一个转折期。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华国锋同志提出的“两个凡是”,就是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不把这两个“凡是”推倒,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怎么平反呢?邓小平同志怎么复出呢?怎么会有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呢?不可能的。

所以在1978年提出这个问题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它特定的历史针对性,这个影响就非同小可,这就超过了胡适,也就超过了周扬。正是这样一场讨论彻底粉碎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新蒙昧主义的精神枷锁,使文学政治的附庸从属地位提高了。原

来那样一种凝固的、板结的、一体化的文化秩序就逐渐松动而终于到今天解体了。这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确立的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原则,也使鲁迅研究领域恢复了活力和生机。

新时期以来关于鲁迅的第一次论争,是围绕重新评价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过展开的,大约发生在1977年。这是新时期以来围绕鲁迅的第一次论争。为什么要重新评价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过呢?大家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曾经委托江青召开过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有一个《纪要》。这个《纪要》全面推翻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崇高评价。以这样一份《纪要》作为政治依据,一切跟中国30年代左翼文化有关的人士在“十年浩劫”期间都遭到了残酷的整肃。作为左联盟主的鲁迅从而也在实际上被架空。

这个《纪要》说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政治上贯彻的是王明路线,组织上先是关门主义,后是投降主义。理论上是照搬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的一些思想体系,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照搬他们的思想。所以从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全面否定了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辉煌业绩。从《国际歌》问世到革命样板戏出台这中间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文艺史变成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什么都没有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就留下了所谓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因为“文革”期间允许出售鲁迅著作的白皮本,没有注释的,此外还有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其余都被打倒了,左翼文艺都被打倒了,中间派被抹杀了,右翼就更甭提了。

刚才我提到了《国际歌》,这是插话,就是兴之所至。毛泽东同志讲,《国际歌》当中最重要的一句歌词就是“要为真理而斗争”。前些天我看一个材料,说鲍狄埃的歌词里面根本没有这句话,可惜我也不懂法语。有兴趣的听众可以考证一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糊涂的问题。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两个

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讲话,同年7月又发表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拉开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战线拨乱反正的序幕。

在这样一种历史大背景下,鲁迅研究界迫切需要增进共识。因为当时已经复课了,现代文学史课程要开讲,那我们怎么讲嘛。讲到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涉及到怎么评价“创造社”和鲁迅,讲到左联涉及到怎么样评价左联和鲁迅的关系,讲到两个口号论争,涉及到怎么样评价这两个口号的功过。当时北京各个高校的老师非常的着急,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三校联合发起,召开了三次大规模的研讨会。一次讨论革命文学论争;1928年的论争,到底什么地方鲁迅对了,什么地方郭沫若对了;讨论左联的功过。在北大的那一次讨论最激烈,就是辩论两个口号的优劣。当时老师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我们要讲课,讲课要求把准确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因为课堂上不是提倡发表各自的创见,是要把学术界的公论传授给学生。

这几次讨论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是推翻了“四人帮”对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那些污蔑、不实之辞,充分肯定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优良传统,提倡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时叫新兴文艺理论,以及培养了一支坚强的左翼的进步的文艺队伍。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就是军事队伍,总司令是朱德;另外一支队伍就是文化大军,总司令就是鲁迅。正是这两支军队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讨论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分歧,其中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对两个口号问题的评价。

关于两个口号问题大家可能陌生一点,我重新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保加利亚的革命家叫季米特洛夫作的报告,号召在全世界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当时共产国际的总部在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

国际的代表是王明，副代表是康生。他们就把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到中国来。康生要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萧三写了一封信，托鲁迅转交上海文艺界的地下党组织，并主动提出要解散左联，建立新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

所以1935年的下半年，中国革命是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由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的“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一直到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红军脱下军服穿上国民党的军装，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当时上海文艺界的地下党组织决定重新成立一个团体，叫做文艺家协会。周扬借鉴了苏联的做法，率先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号召当时各个阶层各个派别的作家都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要努力地创作抗日救亡的作品。当时很多人拥护“国防文学”主张，但也有人反对，这样就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当年参加这个讨论的左翼文化界的人士有一百多人，发表的论争的文字有二百多篇，总的字数多达100万字。

鲁迅对“国防文学”口号是持保留态度的。他经过跟冯雪峰、胡风、茅盾等人商议，重新提出了另外的一个口号，叫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样，一个进步文艺阵营就出现了两个口号。鲁迅为什么在周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以后还要重新提出一个口号，是不是有意要标新立异，自己拉一个队伍搞一个宗派？恐怕不是这样。就是“国防文学”的拥护者，对于这个口号的解释也不一致，甚至有一些偏颇。问题并不在口号本身，往往在于对口号内涵的阐释以及是怎样实践。这个道理我觉得大家很好理解。

你说社会主义好不好，对不对，毛主席不是说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吗？印度也搞印度的社会主义，墨索里尼不是自封为社会主义者吗？我们过去有僵化模式的社会主义，今天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不在于口号本身。“国防文学”口号不是不可以用，而在于对这个口号本身的解释。

周扬和他的拥护者对口号的解释有些偏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创作国防题材的作品作为参加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入场券。你想参加统一战线吗?那你就写抗日题材的作品。鲁迅说我是主张抗战的,这属于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民族感情,但我一定要写抗战题材的作品,比如说我写《阿Q正传》那也不是抗日题材。张恨水写“蝴蝶鸳鸯”、哥哥妹妹,你就不让他抗战了吗?他也可以抗日嘛!只要抗日,“蝴蝶鸳鸯”、哥哥妹妹都可以。如果以创作国防题材的作品来作为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入场券,就会形成宗派主义、关门主义。

另外一个是一致战线内部要不要一个核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内部要不要显示它的领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八个民主党派,但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有一个领导机构是统战部。搞统一战线不是大锅烩,有一个谁统谁的问题。当时像周扬的追随者徐懋庸先生,他就讲左翼艺术家不应该挂特别的徽章。如果你在统一战线内部显示我是左翼,那就会把别的阶级的战友吓跑。为了纠正这种解释的偏颇,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意思是说,我们统一战线是以抗日为旗帜,而不是以写不写国防题材的作品为标准。在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不仅不能放弃,而是要加重放大,在统一战线内部,不同的文学派别还可以互相批评。我理解,这两个口号大概有这样一些区别。

现在看起来,当时上海文艺界发生这样的分歧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这两个口号的提出者都竭诚地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且愿意为此而斗争,双方都是爱国的,都是要抗日的。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党的政策正处于一个重大调整的历史关头,而上海地下党组织又跟陕北党中央远隔关山,音讯不通,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个政策的。所以左翼阵营内部产生一些认识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究竟哪一个口号更加符合党的统一战线的需要,更能够

全面体现党的方针政策？1977年的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见仁见智。有的说鲁迅的口号太左、太片面，不能作为统一战线的口号，只能作为左翼的口号；有人认为周扬的口号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片面强调写国防题材的作品是左，导致关门主义；不提无产阶级领导是右，是右倾投降主义。有的说周扬执行了王明的右倾路线。但反驳者说，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1938年才形成的，而周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是在1935年，当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还没有形成，怎么周扬就提前右倾了呢？

当然有人说不是右倾投降主义，但也是路线性的错误。“国防文学”倡导者到底犯了左的错误还是右的错误？周扬刚开始复出的时候，我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去找过他，访问他的时候他好像认为左的偏差也有，右的偏差也有。总而言之，当时很年轻很幼稚，对鲁迅很不尊重。后来他公开发表谈话的时候，只承认有左的错误，不提右的问题。

过去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左是要革命的，太热情太急躁就左了；右是不革命，想取消革命，所以宁左勿右，而没有像我们今天认识到左给革命造成的危害绝不低于右，没有这种切肤之痛。所以当时围绕两个口号的优劣以及“国防文学”口号是左还是右，还是左右兼而有之，学者之间展开了论争。

那次讨论是在北京大学，我记得夏衍同志去了，周立波同志也去了。后来罗瑞卿打个电话找周立波，周立波提前退场了。当时我主要批评“国防文学”口号的局限，认为没有鲁迅表述得全面，底下有些学生听得不耐烦，也有起哄的，认为我太僵化了，还是“四人帮”的那些观点，缺乏今天这样祥和的气氛。

我有一个老师李何林先生，当时会议组织者一定不让他发言，认为比较僵化，所以讨论会开得有点剑拔弩张。今天我们回顾发生在新时期之初的这场论争，我觉得应该吸取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一个就是必须克服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毛泽东说过，我们党有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就是有宗派。党外有

党,党内有派,无党无派,千奇百怪。文艺界也是有的。在延安也有这个派那个派。上海时期有雪峰派,周扬派。

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残余如果不能肃清,很多问题就不可能达成共识。当前文艺界有没有,我觉得不团结的因素还是有的,给我们很大的困扰。比如说今年12月中国作协要换届,谁来当这个主席?大家都知道巴老已经病重,不可能做任何具体工作。他是中国文学的良心,大家都拥护他。那么万一巴老旗子一倒,谁来扛这个旗?是王蒙,是刘白羽?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谈不清楚。

1977年开展左翼文艺运动讨论的时候,左联时期很多老战士还健在,他们经过了十年浩劫,在浩劫当中备受磨难,劫后余生。当时刘心武很激动地对我说,别忘了“文化大革命”挨斗,头发一把一把被揪掉了,夏衍被打断了腿……所以对历史上论争双方观点评价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历史功过,而且难免影响到他们的现实处境。这些老同志直接参加讨论,难免夹杂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在文字上也有情绪化的表现,妨碍我们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学术评价。所以宗派主义情绪不克服的话,你这个讨论话题就不清楚,就容易情绪化而不是学理化。

第二个教训,就是我们评价左翼文艺运动历史上这些功过的时候,应该善于用科学的态度来进行分析,而不应该过分纠缠于个人的责任,把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地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比如说在“文革”期间,冯雪峰在政治高压之下写了一份交代材料,题目叫《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这个材料呢,在鲁迅研究界广泛流传。后来在1979年2月首次刊登于《新文学史料》的第二期。

这个材料涉及到30年代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的领导人周扬、夏衍,同时也谈到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等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生活书店指的谁呢,是邹韬奋,进步的出版家。冯雪峰在这个材料当中同时郑重声明,说在1936年的时候他没有发现周扬、

夏衍这些人跟王明有什么组织的联系,现在也想不起可供追查的线索;在专案组提问时他说我不知道周扬跟王明有什么组织联系,现在我也不清楚。

所以后来周扬非常感动,说雪峰没有趁“四人帮”恶毒诽谤他的时候对他落井下石,把一切错误和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虽然雪峰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所谓揭发他的话,其中也有不实之词,但并不是存心诬陷他,他觉得雪峰还是比较公道的。这是周扬的看法。

可是夏衍的看法跟周扬就不尽相同。1980年他在《文学评论》发表一篇文章,叫做《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1985年又推出了他的长篇回忆录,叫做《懒寻旧梦录》。有人说既然懒寻你还寻它干嘛呢,说明并不是懒寻,而是在追寻。1991年夏衍又发表了一次谈话,叫《夏衍谈左联后期》。在这些谈话和著作当中,夏衍多次或者委婉、或者直接地对冯雪峰进行了批评,说雪峰有宗派情绪、行班情绪、偏见、固执、骄傲、一言堂等等。他还说两个口号到底哪个更符合党的精神,当然是“国防文学”口号,因为鲁迅毕竟不是党员,他提出的口号标新立异,不利于统一战线。

夏衍这样一些谈话和看法,在鲁研界又引发了一些论争,有些和他商榷的文章。我认为反思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不考虑当时特定历史背景,论争的一些特定的语境,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把很多问题的产生都归结于个人的品质问题,这恐怕不是很恰当的。这是今天回顾起来,应该总结的第二个教训。

第三,就是评价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是非曲直,应该是就事论事,就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是什么就说什么,宜粗不宜细,特别是不应该机械地跟路线斗争和路线错误挂钩,更不能够搬用那种“路线错了,一切皆错”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模式。路线错了,不一定什么都错。上级的决策错了,个别党员就没有英勇行为了?基层组织就没有对的了?

当时有人认为“国防文学”口号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而